

丘吉尔在1945年选举中失利原因评析

戴德铮

1945年是英国保守党领袖、内阁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历史生涯中“声名赫赫”的时期之一，人们给他盖以“战时英雄”、“领导英国度过‘光荣时刻’的人”、“祖国掌舵大师”、“时代的天才”、“反法西斯著名领袖”等等桂冠。

按照资产阶级政治的一般规律，执政党的领袖威望达到鼎盛时期举行大选，连选连任的可能性最大。对于1945年7月5日开始的国内大选，丘吉尔和保守党人也自认为稳操胜券。在波茨坦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的间隙，丘吉尔充满信心回国欢庆胜利，以至于行李中的日常用具都没让下属带回，“他相信自己会回来的”。当时，英国和世界著名的评论家、观察家也估计，丘吉尔必胜。连斯大林对丘吉尔再次组阁也充满信心。

然而，历史开了丘吉尔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7月26日，选举结果一宣布，世人震惊，工党获胜，在下院得393席，保守党及其追随者一共才得213席。一夜之间，使丘吉尔从“全国领袖下降为一党领袖”。他“悲痛万分，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①

丘吉尔竞选的失败，看起来出人意料，却也是英国社会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丘吉尔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内阁首相，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呢？不可否认，领导英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一起打败德意法西斯、制约日本法西斯方面，是“卓有建树”的。为此，统治阶级“感谢”他，给他种种荣誉，“捧来”了各种“桂冠”，这些对丘吉尔来讲当之无愧。但不应忘记，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决定英国统治根基的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他们对当权人物的要求，是从能否连续不断的获取最大的利润、巩固自己的地位、维护其世界霸权为出发点的。战时，丘吉尔及其内阁使垄断资产阶级发了一笔战争财，其利润从1938年的1368百万英镑猛增到1945年的2390百万英镑^③。然而以下令人**生**畏的事实，又使得垄断资产阶级不得不暂时抛开丘吉尔，另寻代理人。

其一，英国由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富国，降为内外乞怜的二等角色地位。

众所周知，英国的世界霸权是建筑在雄厚的经济实力上面的。尽管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基础从顶峰跌落下来，但也应看到，经济力量的衰落比起革命引起的政治上的突变，毕竟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因而，一战后英国在经济上所拥有的力量仍然不可低估。英国的煤、生铁、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到二战前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资本输出，仍占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列宁称一战后的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富国”^④。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优势已基本丧失。战争中英国死伤军民76万，其中大多数是垄断资本家赖以榨取最大剩余价值的青壮劳动力。战时德国法西斯的空袭，仅使英国商船、货物等就损失约30亿英镑。战争期间的军费支出250亿英镑，用去了战前黄金美元储备的大部分。庞大军费开支，使英国债台高筑，国债从1939年的72.473亿英镑猛增到1945年的214.731亿英镑，外债达30亿英镑。其中除美国6.5亿美元外，还有原附属国、殖民地的140亿美元，英国从债权国变为大债务国。战争又使英国工业总产值下降，1945年比1938年减少了20%，出口贸易紧缩，1938年出口贸易总值达471百万英镑，到1944年则下降到266百万英镑，出口量锐减了69%，使英国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国际收支赤字，逆差达40多亿英镑^⑤。丘吉尔内阁在任时经济地位如此衰落，垄断资本家自然是不会满意的。

其二，由世界上第一个军事大国变为仰人鼻息的小伙伴。

位居英伦三岛的英国，很早就确立“举世无敌的世界霸权”。恩格斯讲过：“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⑥。经济上的富有，使英国军事力量十分强大，这是英国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以“双强标准”为核心的海上军事力量，一直是维持大英帝国世界霸权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柱。为此，荷、西、葡、法、德、美曾与其进行过生死搏斗，但都因碰到了这个“老岩石”而狼狈不堪。只是到19世纪末，美、法、德经济上逐步赶上或超过英国，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与之格斗，结果“赢得了战争，输掉了优势”，军事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尤其是海军大伤元气，不得不在1921年至1923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改海军“双强标准”为美1：英1。但从整个军事力量来看，英国并不在美，尤其法、德、意之下，英国战舰仍可在世界各公海任意游弋，横冲直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军事上再次取得了胜利，并且战果辉煌，但英国军事力量遭受的打击仍是十分惨重的。德意日法西斯海陆空的联合进攻，不仅使英国军队从欧洲大陆狼狈撤退，还迫使其军队困守英伦三岛。只是由于苏联军队和其他国家人民各方面的牵制和打击，为英国造成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英伦三岛才侥幸没有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英国军队重返欧非，也主要靠欧非人民奋力搏斗和美军的卵翼。法西斯德国无限制的潜艇战，使英国海军遭受重大的损失，只能固守英伦三岛本土。由于军事力量的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也无法顾及，也没有力量给予自己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以应有的保护，使其免遭军国主义日本的威胁。大战期间日军在英国太平洋各殖民地、自治领横行时，这里的人们依靠美军更多于依赖英军。前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曾承认：“正是美军挡住了日本人。”^⑦

其三，世界上第一个殖民帝国，变成分崩离析的“烂摊子”。

1876年，英国的殖民地面积才为2250平方公里，1914年则扩大到3350万平方公里，为其本土面积的110倍，超过了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面积的总和。1914年英国的殖民地人口也扩展为39350万人，约为本土人口的9倍。英国建立了一个自称为地跨五大洲、“日不落”的殖民大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又劫掠了不少新的殖民地。由于殖民地、附属国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是其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是其生存的“生命线”。为此，列宁把英帝国形象而又准确的称为“殖民帝国主义”^⑧。

但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生命线”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危机。在1945年大选前，英国殖民地和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被人们看作英国经济繁荣泉源之一的东南亚民怨沸腾；被人们称作英国内湖的印度洋已不再风平浪静，印度独立呼声已呈大势；中国革命武装向日本法西斯举行全面大反攻，胜利迫在眉睫。殖民地、附属国和势力范围的物质资源、市场不仅不能为英国随心所欲地占有，而且这些地方掀起了反英风暴。英国雅各布少将就曾

预言：“印度斯坦半岛拥有力量的劳动力后备和基地很可能被利用来达到相反的目的。”^⑩

这种局面，使英国垄断资产阶级痛心疾首。要想解决这一困境，他们历来得心应手之法，就是以“换马”来转移视线，伺机再去镇压即将或已经起来的民族解放运动。

按理说，英国大选前国势的不景气，应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帝国主义特征的突出体现，是法西斯发动战争带来的恶果，是英帝国资本主义制度没落的结果。然而，垄断资产阶级却把英帝国的衰落归结为政府内阁的失败。这样，他们可以推脱掉本阶级的责任，达到维护自己统治的目的。所以，在决定战后政府首脑的人选时，表面上对丘吉尔赞颂之声不断，提名丘吉尔为候选人者却寥寥无几。后来有人作了民意调查，不少垄断寡头认为，“作为战时领袖，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由于他工作出色，如以十分为满分，他能得九分——但是作为未来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⑪历史告诉我们：抛掉丘吉尔的恰恰是他的后台老板。

二

如果说，“失宠”于垄断资产阶级，是导致丘吉尔突然倒台的根本原因的话，那么，英国大众在战中和战后情绪左倾，则是丘吉尔内阁垮台的又一重要因素。

1945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的溃降，意味着人类正义战胜了邪恶、进步战胜了反动。这一点，不管任何阶级和集团承认与否，这都是客观事实。英国人民群众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他们已“成熟起来”了，从某些侧面看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认为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可靠力量，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不仅体现在两种制度在对待法西斯的态度上，社会主义国家反对法西斯立场坚定，而英国资本主义统治集团对法西斯实行妥协，只是在其统治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才走上抗战道路；而且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苏联从1917年到1945年短短28年，经济上发展很快，强大的军事力量抗衡了当代武装到牙齿的法西斯集团大部分军事进攻，并最后直捣法西斯德国的老巢柏林。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对英国人民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向往社会主义。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推翻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从阶级力量对比和人民的思想觉悟看，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英国人民抓住了1945年大选这一有利时机，来反映自己的思想和要求。

选择保守党，英国中下层人民深感忧虑，因为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自从1833年“托利党”改为“保守党”以来，英国实行的均是资本主义大国强权政治。尤其是保守党在一战中给人们带来的苦难，2、30年代经济大萧条年代给人们带来的失业和痛苦，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带来法西斯猖獗的恶果，使他们记忆犹新。总之，选民不愿忘记自一战以来，英国的政治生活几乎完全被保守党垄断，结果造成的种种失误的教训。正如黑尔什姆勋爵后来承认的那样，“选举结果并不是选民有意跟丘吉尔先生作对……这种抉择出于人们长期以来对保守党的原则、实践及其成员状况的不满，内心深处素有积怨”^⑫。

而丘吉尔作为保守党的在任领袖，不可否认，他领导英国人民反法西斯功勋卓著。但如果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对人民来说并不是“福音”。丘吉尔在政治上有两大特点，一是以反对共产主义而著称，他扬言要把“苏维埃扼杀在摇篮里”，大肆鼓吹反共产主义，二战爆发前后，为打败危害自己阶级利益的法西斯，他明智的把砍共产主义的“剑暂收进了鞘”，但从思想深处并没有改变其“反共”立场，战争一胜利就发起对共产主义的“冷战”。在国内，“他镇压了托

尼潘狄的矿工运动”，“公开站出来，带头反对总罢工。”^⑫二是“秉性尚武好战”，他在非洲、古巴以及欧亚等地区到处镇压革命，曾“赢得”了“善战之人”的名声^⑬。丘吉尔这些“光荣历史经历”与胜利后举国上下都在寻求持久和平的现实，以及人们向往共产主义的左倾情绪，自然难以使英国人民选择丘吉尔作为和平时期的首相。

然而，工党在这次大选中确有着极利的条件。工党自从1900年2月踏上英国政治舞台以来，曾于1924年和1929年两度执政。尽管在维持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上与保守党并无差别，但其执行的偏左政策给英国选民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战以来，工党充当反对党角色，在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顾全英国大局，以“务实家”风度出现。另一方面，工党主张改革，顺应了英国人民在战争后期在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工党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在政治上主张改革国家机器、废除贵族院，建立“民主国家”；在经济上主张实行凯恩斯主义，扩大国家企业局，实行增加公共开支，对国有化企业的投资，减少税收和控制进口等措施，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增加就业；对外主张缓和裁军，改善同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的关系。这对保守党来说，是不可思议甚至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工党“居心叵测地想把一种官僚统治的、集权主义的永久性制度强加于英国”，是“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看法很不合英国人民的情绪，人民在选择时，自然不选择丘吉尔的保守党，而宁愿选择战争中似乎不大起眼的工党。这种情况在英国军队中有明显的反映，陆军时事局曾在1944年组织军人以排为单位讨论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大多数军人不同意保守党关于战后的宣言，而倾向于工党的主张。丘吉尔后来也承认，军队对他在选举中的失败有很大影响。

工党的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给选民的印象也较好。他于1935年就任工党首脑，1940年率工党加入丘吉尔联合政府。一方面，以务实精神工作，尤其是他在1943年升任副首相后，当丘吉尔在外交舞台上叱咤风云时，他却将主要精力用在监制战后重建规划上；另一方面，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也吻合了选民的情绪。

综上所述，1945年希特勒政权垮台后，当丘吉尔得意洋洋之时，恰恰是民众对其党和他本人的不信任达到高峰。丘吉尔的落选也就顺理成章了。丘吉尔自己也曾在大选刚一结束时沮丧的承认，“选民的裁决以压倒一切之势表现出来”。苏联作者特鲁汉诺夫斯基在《丘吉尔一生》一书中指出：“1945年整个欧洲，包括英国，人民群众的思想是向左转的”，丘吉尔在大选前“没有理解、也没有看到这一点，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⑭。

三

竞选不顾民情和策略，是丘吉尔倒台的又一重要因素。

竞选的纲领和选民思想情绪在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选举中是否能制定正确的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至少走错了两步棋：

在组织过渡政府问题上，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犯了一个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

决定这次大选的是丘吉尔。他在1944年10月就宣布战胜德国之后立即举行选举。5月7日，欧洲战事结束以后，丘吉尔又不想马上大选，要等到打败日本法西斯以后进行。联合“战时内阁”的工党和自由党鉴于普通党员渴望变革，迫使其单方面退出了联合政府。其实，工党领袖艾德礼等对于选举获胜并无多大把握，建议联合政府工作到本年10月。丘吉尔对于工党、自由党一面拆台，一面又充当好人的表现非常愤怒，立即在1945年5月23日提出辞职，宣布7月5日大选，三个星期后宣布选举结果，并且马上组织了所谓“过渡政府”。在这个“政

府”中，完全是“一边倒”，排除了工党和自由党的一切成员，由保守党内最反动的派别人物担任，其中有“慕尼黑协定”的拥护者，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执行极右政治路线的一些人。

丘吉尔的这一不明智决定，实际上“丧失了现实感”^⑮。一方面，过渡政府排除以艾德礼为首的工党成员，并不符合选民心理。因为丘吉尔在领导战时国民政府期间，过多的注重了军事和外交权力，而对于国内各条战线，几乎全部由工党负责，让工党在战时内阁中几乎享有同保守党同等地位，在联合政府中享有本来不应享有的权力（不仅是政府职位）。所以，到战争结束时，国内各条战线似乎都是由工党大员负责，艾德礼是枢密大臣和副首相，贝文在劳工部供职，莫里森是内政大臣兼治安大臣，道尔顿是贸易大臣，汤姆·约翰斯顿是苏格兰事务大臣。重要的国内大事，大都是工党成员负责处理。丘吉尔威望在外鼎盛时，艾德礼为首的工党形象在国内选民中的影响正逐步提高。另一方面，丘吉尔组成的“临时政府”突然把工党和自由党的成员全部赶出去，“政府”重要职位均有威望不高的保守党大员独占，则使选民产生了“逆反”心理。因为“执政”大员给人印象均如丘吉尔那样丝毫不思改革，如果战后政府由这些人领导，英国将可能又回到2、30年代保守党领导的境地。丘吉尔这种不恰当的决定，自然严重地损害了自己在未来选举中的地位。

过份的渲染丘吉尔在二战中的功绩，猛烈的对工党及其领袖们进行人身攻击，不恰当的反对社会主义，是丘吉尔及其保守党在1945年选举中所犯的第二个策略上的错误。

保守党的竞选口号是：“选举国民领袖——帮他完成历史使命。”丘吉尔在选举期间到处进行竞选旅行，当他的竞选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经常是前边走着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大肆渲染：“注意第三辆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到处挂着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写着：“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这种宣传效果适得其反。一方面，战争的胜利，是广大英国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用血汗、生命换来的，将胜利归于丘吉尔一人，只会受到英国多数选民的鄙弃；另一方面，战争的胜利，并不全是英国劳动人民的“福音”，虽然战胜了法西斯，保住了英国，但战争给英国许多家庭带来的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精神上的无比痛苦。战后英国人民的注意力不是沉醉于过去的胜利，而是关注于如何开创未来。

然而，保守党竞选者们，在大力宣传丘吉尔的同时，并没有面对现实提出任何有积极意义的纲领，而把选举的主要力量放在批判自己的政敌上。他一方面对工党领袖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宣称他们“无能”、是“盖世太保”、“极权主义者”，工党大员不久以前还是战时内阁的重要成员，曾忠实地同丘吉尔共事多年，对他们进行攻击，实际上也是给自己脸上抹黑，正好帮了工党的忙。另一方面丘吉尔危言耸听的恐吓英国选民，说“工党上台是对英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的危险挑战”，并声称工党若在选举中获胜，将意味着英国可能处于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境地。这种恐吓手段是不明智的，因为选民们已经了解工党的纲领和措施，这些纲领、措施并不是“盖世太保”的理论。况且，这时的英国选民比起战前已“成熟”多了，更清楚地明白了保守党的真实用意。保守党的著名活动家R·A·巴特勒很清楚地看透了这一点，他写道：“如果不是把宣传战后的政策放在次要的地位，如果不是过份地利用丘吉尔的威望和不适当地攻击工党的话，那么情况可能会好一些……”^⑯。

丘吉尔在竞选中攻击工党搞社会主义。他在一次竞选中说：“朋友们，请听我忠言相告，社会主义政策与英国的自由思想可谓之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毋容置疑，社会主义同集权主义和卑鄙的国家至上主义则是水乳交融，难分难解。在整个社会生活和国家工业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政府，不会允许人们自由地、尖锐地、甚至激烈地表示不满情绪……他们

还会求助于某种形式的盖世太保的支持。”^{①⑦}保守党人在竞选讲话中都强调工党领导会走向官僚统治的危险、会造成对民主制度的威胁。一位保守党宣传员甚至讲出了这样的话：“克里普斯(当时工党领导人之一—作者)的社会主义国家同黑衫党的法西斯主义国家是同样货色。”^⑧

丘吉尔及其保守党要人这样对选民进行宣传，并没有得到向往社会主义和追求和平、发展、改革的英国人民的好感，反而使选民悄悄靠向了艾德礼。对此，G·佩林指出：“使人感到惊奇的是许多英国人似乎看出了工党和社会主义苏联之间有某些一致性。红军在东线的胜利，证明与保守党的主张相反，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给国家带来了利益。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认为，管理英国的经济和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最好的方法便是实行国家干预。”^⑨

工党在1945年的竞选中的宣传，顺应了英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提出了符合选民情绪的重要的改革纲领，许诺将在英国经济的许多重要领域内实行国有化、彻底改革社会保险制度、大力进行民用住宅建设，保证战后将全力保持在战争中形成的英苏联盟。这一纲领的目的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但与保守党的陈调重谈相比，符合英国人民的改革愿望，有巩固国家利益、复兴大英帝国的设想。工党对保守党的谩骂、攻击，除了有选择的反击，并不过多的把保守党作为政敌进行攻击，而是全面宣传自己的纲领。这些作法，赢得了选民对工党的好感。

另外，工党在竞选活动中的作风也明显地符合选民的口味。选举前，两党到处游说，丘吉尔依靠自己执政的特权，坐着豪华的敞蓬汽车，四处参加集会，工党领袖艾德礼则和妻子一起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给人以朴素、节俭的感觉。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艾德礼演说朴实，对选民态度谦虚，与丘吉尔放肆的自命不凡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

综上所述，丘吉尔1945年的落选，是由于他失去了本阶级的鼎力支持，失去了选民基础，犯了一系列策略错误，以及其它不利的因素合力作用的必须结果。

这一历史事件说明：当今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制度的实质，完全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任何人损害或违背了这一根本原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资产阶级的民主体制是靠欺骗民众维护的，只要群体意识不会从根本上触动其国家意识，资产阶级也是会因势利导的，如果谁看不准这一点，也会被资产阶级所搁弃。在历史的重大转折关头，适应国际、国内“气候”的变化，制定出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的“最佳”政策，是资产阶级确定上台人物执政的重要条件，谁做不到这一点，难免会丢官罢职。正如列宁深刻揭露过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议会选举，只是“为了愚弄‘老百姓’”^⑩，只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压迫、镇压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⑪

注释：

①⑩⑪⑫⑬⑭⑮ (英)阿伦·斯克德、克里斯·库克：《1945—1949年战后英国政治史》，企鹅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6、8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③ (英)《统计年鉴摘要》第84期，第229页。

④⑤ 《列宁选集》第3卷，第74、192页。

⑥ G·D·N·沃斯威克、P·H·埃迪：《1945—1950年的英国经济》，牛津1952年版，第47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⑧ (英)奥·S·弗兰克斯：《英国与国际潮流》，伦敦1955年版，第21页。

⑨ (英)《外交事务》杂志，1951年版，第223—224页。

⑫⑬⑭⑮ (苏)特鲁汉诺夫斯基：《丘吉尔的一生》，苏联思想出版社1977年版，第380、377、380页。

⑯⑰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9、410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